

•智库要闻•

第十六期东吴智库学者沙龙成功举办

4月7日下午,第十六期东吴智库学者沙龙在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 1005-5536 会议室举行。本期学者沙龙围绕“教育学术论文与资政报告写作策略”主题,邀请了江苏省“紫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社科优青、无锡太湖学院校长助理阚明坤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教育学院院长冯成志、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人文社科处和教育学院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沙龙由东吴智库研究员、教育学院教授王一涛主持。

首先由冯成志院长致欢迎辞。他简要介绍了教育学院与东吴智库,并表示阚明坤教授的加盟将为我校教育政策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与活力。随后,段进军院长为阚明坤教授颁发东吴智库特聘研究员聘书。

在分享环节,阚明坤教授从写作活动的特点谈起,围绕教育学术论文写作的概念、意义作了详细阐释。他指出教育学术论文是对教育领域中的某种原理、现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科学研究,表达创新见解和知识的文体,具有科学性、严谨性、

专业性、创造性特点。随后,他引用教育目标分类图,强调了科研对于高阶学习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将科研和教育相互融合。针对如何写好教育学术论文,他认为一是凝练研究方向,二是注重素材积累,三是构思文章框架,四是创新撰写学术论文。针对资政报告的写作策略,阚教授结合自身经验,根据资政报告的性质、特点,讲解了撰写要领和撰写技巧。他指出资政报告具有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特点,是运用基础理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咨政研究讲究“专”、“精”、“深”,需要做到简明扼要、直击要害;抓住要点,提出对策;化繁为简,追求精要。

在互动交流环节,阚明坤教授围绕研究方法、选题角度、报送渠道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与会师生均表示受益匪浅。

东吴智库学者沙龙是人文社会科学处和东吴智库精心打造的专题学术沙龙,旨在营造智库学术氛围,凝聚学者研究力量,提升智库政策建言水平,培育智库研



究新锐力量。目前已成功举办十六期,采用“圆桌论坛”形式,先后邀请国家、省、市实务部门专家学者与智库研究人员面对面探讨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东吴智库首个调研基地在太仓双凤镇揭牌



近日,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调研基地揭牌仪式在太仓市双凤镇举行,太仓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施燕萍和苏州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于毓蓝共同为调研基地揭牌。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人文社科处相关同志、双凤镇党委领导班子等共同出席揭牌仪式。仪式由双凤镇党委副书记朱清主持。

此次与双凤镇合作建立调研基地是东吴智库设立的首个基层基地,也是东吴



智库长期服务基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内生需要。揭牌仪式后,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以“艰苦奋斗精神:百年党史红色精神谱系之魂”为主题讲授了党课。

近年来,东吴智库秉承“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谋发展、以贡献求支持、以合作促双赢”的发展理念,坚持“立足苏南、服务江苏、辐射全国、影响海外”的发展定位,以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为代表的东吴

智库团队,结合双凤镇发展实践需求,积极开展学术探索和理论研究,编制了全国首个以农村基层党建为基础的《双凤镇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发挥了指挥棒作用,引导各基层党组织强考核、建载体、推项目、创品牌,把党建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党建高质量引领双凤镇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建立调研或实践基地、政策观察点,旨在响应省市智库办关于智库建设的新要求,对基地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长期观察、持续跟踪,通过实地调研,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探索新规律,保障智库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产出高水平政策建言和高质量咨政报告,更好地服务当地政府决策,不断提高智库专业化、特色化和品牌化水平,努力构建高校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专家视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蕴涵

方世南

编者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也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有着明晰的价值指向，展示出多样性的价值诉求、价值目标和价值愿景。

作者从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互促共进的价值蕴涵，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蕴涵，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四个方面，全面阐述其在紧密联系中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价值色彩和价值诉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也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十四五”时期十二个方面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三专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设四个主题，分别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有着明晰的价值指向，展示出多样性的价值诉求、价值目标和价值愿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蕴涵，主要表现为，人的价值与自

然价值互促共进的价值蕴涵，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的价值蕴涵，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这些价值意蕴在紧密联系中彰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价值色彩和价值诉求。

一、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互促共进的价值蕴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互促共进，指的是，在属人的世界里，人与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和无法分割开来的统一整体，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发展趋势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连接起来而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共享共同体，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下得到双向促进和提高。

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的两大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也是人类必须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重大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始终与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着的。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不同理念和不同态度，直接决定着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简言之，直接决定着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得失、多寡以及双向互促共进程度。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实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明确的。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总体上处于人对自然的屈从和臣服阶段，人的受动性，即人受制于自然界和外部条件的特性

处于主导地位，自然价值得到呈现，而人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人的能动性空前张扬，自然界成了人恣意索取的对象，征服自然和向自然界开战以获得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充分显示人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重要表征，人的价值在高度显示的同时，使自然价值边缘化、缩小化，最终也无法保障人的价值。只有到了克服和超越工业文明局限性的生态文明时代，才能彰显出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主体，才能构建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得益彰的崭新格局。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有助于人们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视为绝对的人是主体、自然是服从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的关系，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是一种始终处于平等关系和双向互动建构关系的主体际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有着血肉相连的内在联系，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物质资料，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有机的身体。马克思指出，人在自然界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因而具有自然属性，表现为人的受动性，人类实践活动始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必须自觉地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即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自然物，是一种有着社会交往关系、呈现出社



• 专家视点 •

会属性的类的存在物。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创造价值和获得价值,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类是在不断创造和获得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必须要充分考虑自身的价值,并且是在不断满足自身价值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但是,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也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包容和同构关系。人的价值的获得是以自然价值的存在和发展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条件的,不注重和维护好自然价值,也就没有人类价值,即使暂时性地获得了一些价值,也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一书中认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一切事物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有其内在价值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因此,维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就是人类为了自身价值实现而必须肩负的一种客观义务。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不仅人的身体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甚至人的思维能力、创造精神文化的能力都是大自然赐予的。人类如果只是顾及自身价值而忽视自然价值,整个生态系统在价值链条上就会失去动态平衡。因此,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呵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尊重自然、呵护自然就是尊重和呵护人自身。不能只是让人类只满足自己的需要,更不能通过任意地征服和破坏自然获得人类自身的价值。人类必须充分尊重自然价值,维护好自然的稳定性、完整性、多样性和延续性,在人和自然双向价值保全和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指的是,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能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人文价值,又能同时创造出丰厚的经济价值。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实现,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经济与人文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重要价值形态。

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以及良好人际关系都会彰显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普适性的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前途与命运、代内与代际、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关切、主动反思和不断追求精神,人文精神通过人道主义、人文情怀、人文理想、人文氛围等表现出来,科学的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深刻关切,将人文精神贯穿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中,通过伦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化学、健康学、生命学等表现出来,同时,人文精神之光普照到人与自然关系上,推动环境伦理学、环境教育学、环境管理学、环境文化学、环境健康学、环境生命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人类更加要关注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注重人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人文精神既是创造人文价值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巨大文化软实力。

通过人文精神实现人文价值,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古今中外生态与文明内在关联的历史经验说明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的关系。马克思在 1868 年 3 月 25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阅读一本很有趣的书,是当时担任巴伐利亚兽医管理局局长、大学教授、全国农艺实验所所长的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 年)一书,马克思指出:“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他曾经用希腊文著书)。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态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源泉,具体的和现实的生产力应该是注重生态环境发展的生产力,简而言之,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生态环境作为劳动对象既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源泉,也成了人类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源泉,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质量,人类也显示出了作为自然界主体的强大力量,人类在持续不断地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人类自身作为主

体性的自身价值。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类端正科学的价值观,对生态价值的可持续利用,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经济价值、人的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一体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楼兰古国、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都发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田野肥沃、物产丰富、生物多样的地区,造就了繁荣富庶,后来由于过度砍伐树木而导致土地荒芜、文明衰落。我国古代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都曾经水丰草茂、人丁兴旺,由于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经济衰落。唐代中叶以来,我国经济中心逐步向东、向南转移,很大程度上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迁有关。这一客观事实充分说明,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一样,都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形成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是人文精神助推人文价值、经济价值实现的强大力量。生态环境发生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发展予以重大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的价值蕴涵,要求人类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生态理性、科技理性等多方面的关系。以经济理性追求经济价值无可厚非,但是,经济理性、经济价值都是服务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都是为以实现全人类福祉的人文理性、人文价值为目的的。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人文情怀下,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生态理性、科技理性发挥着协调共增的重大价值功能,如果无视人文理性、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一味地张扬经济理性和追求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既毫无意义,又难以为继。

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是,马克思是始终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以及与生态环境的优化紧密地结合起来的。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必须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问题,指出:“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

•专家视点•



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象人一样从事活动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马克思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片面地追求经济价值的错误,尖锐地指出,如果生产力发展只是将人当作财富的力量,而不是当作人,那么在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状态下,即使人具有生产力的美誉,但是,一旦人失去了人文理性,失去了人固有的价值,这种经济价值越多,人越是受到摧残而不成其为人。马克思主义坚持生产力发展中的人文精神和人的价值,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前提条件和价值追求,就是要坚持通过重视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达到生态环境优化以及实现发展的人文性和可持续性。

三、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 续共保的价值蕴涵

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永续共保的价值蕴涵,指的是,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能满足和实现当代人的价值,又能在满足和实现当代人的价值的同时满足和实现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人的价值。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永续共保的价值蕴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彰显的人的价值和自然价值在阶段性与连续性结合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相继、薪火相传的价值发展性,是一种坚持和促进自然界与人类永续发展的价值蕴涵。

人类文明在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局部性、阶段性的断裂现象,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经过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绵延发展的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过程论的思想逻辑,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先辈们与当

代人、当代人与下代人以及子子孙孙世代人在前后相继、薪火相传中不断地创造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将先辈们和当代人创造的价值不断地传承给后代人以促使价值保值增值的历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突出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开放延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体,经历着生长发育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从近期看,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当代人的价值,让当代人得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就业、更满意的收入、更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安全的发展,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长期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体现现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在前后相继中的同时实现。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链条中紧密关联着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实现现代内价值,也无法谈论当代人的价值传承给后代人的所谓代际价值,而没有代际价值,人类社会就无法实现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人类社会有机体就无法生长发育。马克思认为,不考虑自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只考虑本代人财富增加的劳动是一种有害的、造孽的劳动。他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为此,马克思指出,我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呵护好土地,让改良了的土地留给子孙。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

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与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恩格斯批驳了傅立叶的抽象的和理想的所谓满足一切人的需要的论断,恩格斯嘲讽了傅立叶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这种论断尽管听起来是非常武断,可是经过傅立叶论证以后,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成了无可辩驳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永续发展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家园,人类对地球以及在地球上生存的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都承担着重大历史责任,我们应该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习近平,2017);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地确立“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高度注重代际关系以及代际价值,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只是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当作价值实现的话,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与满足下代人的需要以及满足世世代代人的需要的关系。从主客体的关系看,现实的主体仅仅是也只能是当代人,现实的价值也仅仅是和只能是当代人的需要,如果以此来衡量,人们就会无视价值的历史性和动态发展性,代际之间的关系就会被人为地割断,代际价值就无法实现。因此,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永续共保的价值蕴涵,是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专家视点•

生的重要价值原则和价值遵循。

四、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

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指的是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能实现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又能在实现这些价值的同时实现全人类的价值。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展示的将个体价值、局部价值、群体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紧密结合起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识。

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提出了“人的类本质”思想,这一思想以后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人的社会本质”的思想加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出发分析考察“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揭示出人的本质就是人在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的实践活动中证明了的人的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的本质。针对要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和生态危机所叠加的整体性危

机,要实现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生态解放和全人类解放,马克思强调了全人类面临的“类危机”问题,提出了人的“类主体”、“类意识”和“类联合”、“类行动”问题。这些思想都充分体现了将局部价值、群体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与全人类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从全人类整体性发展的高度实现人类价值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质上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地球生态系统与人类生命系统息息相关的情况下,单一的个体、群体、民族和国家都无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呼唤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

随着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趋势越来越明显,节律越来越快,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单一的个体、群体、民族和国家的力量都显得十分弱小。在生态治理中,如果为了局部性的区域利益和单一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将“守土有责”刻板化、教条化,将民族和国家利益优先化,而无视生态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无视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客观事实,过分强调个体价值、种族价值、民族价值,信守

并践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必定走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其结果是,全人类价值根本实现不了,与此同时,任何个体、群体、民族、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无法得到应有的价值和永续的价值。只有站在超越个体价值、局部价值、群体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的高度,注重全人类利益,确立全人类的价值目标,才能激发和强化马克思所说的“类主体”、“类心理”、“类意识”,从而产生强大的“类合作”、“类行动”,在全球不论国别、种族、民族、信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携手合作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习近平, 2017),表现了站在全人类价值立场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襟,是指导人们自觉地将个体价值、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地球生命系统和人类社会世代永续发展的根本指针。

加速数字赋能 擦亮“苏州制造”品牌

段进军

编者按:2021 年 2 月 23 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刊载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教授的观点文章《加速数字赋能 擦亮“苏州制造”品牌》。文章详细解读“苏州制造”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与辉煌成就,分析“苏州制造”未来发展方向,并提出以数字赋能,打造“苏州制造”新品牌是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不会一蹴而就的核心观点。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苏州肩负着“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新使命。无论是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是从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好步的角度来看,千方百计促进“苏州制造”高质量发

展,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该如何在高平台上擦亮“苏州制造”品牌呢?

从无到有,“苏州制造”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苏州制造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应着上世纪 80 年代的“苏南模式”。其发展主要是满足于国内短缺市场的需求,制造业产业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等非耐用消费品和简单的原材料加工业,此阶段大致可以对应于苏州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对应着上世纪 90 年代外向型经济所推动的“新苏南模式”,苏州工业化进程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极大地推动苏州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苏州的世界”变成了“世界的苏

州”,并由此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遵循着传统的大规模、大批量、同质化的发展逻辑,外向型经

加速数字赋能 擦亮“苏州制造”品牌

苏州学习平台
2021-02-23

+ 订阅

作者: 段进军

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苏州肩负着“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新使命。无论是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是从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好步的角度来看,千方百计促进“苏州制造”高质量发展,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该如何在高平台上擦亮“苏州制造”品牌呢?

•专家视点•

济创造了“苏州奇迹”，从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等各项指标来看，苏州都位居中国的大中城市的前列。这一阶段的制造业发展主要是满足于国外市场需求，大致可对应于苏州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第三阶段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发展，属于制造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大致对应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三个阶段环环相扣，构成了苏州制造业发展的逻辑顺序。

大而谋强，“苏州制造”须找准自身优势

从第一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到第二阶段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苏州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苏州实施的制造业战略是根据自己的区情，遵循全球和区域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从开放的全球和区域视角出发，利用上海，服务上海，与上海错位发展，取得今天辉煌的成就，这是苏州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第一轮主要利用了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推动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整个工业化的基础。第二轮发展过程中主要利用了上海浦东的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顺应世界范围内大尺度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统一，推动了苏州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苏州制造”也因此成为苏州的一张靓丽的名片。“苏州制造”既是苏州过去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也构成了苏州未来战略选择的出发点。

目前，苏州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制造业的体系，苏州制造业的门类齐全。工业

经济拥有 35 个工业大类、167 个中类和 489 个小类，有 16 万家工业企业（包含世界 500 强 400 多个项目），是中国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2020 年，苏州装备制造业产值达 10205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29.3%，产值总量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这是“十三五”时期自电子信息产业后，苏州规上工业又一个破万亿产业。苏州工业“家底”越筑越牢，产业强劲支撑。2020 年，苏州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8 万亿元，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三。因此，制造业构成了苏州发展的产业基础，抓住了制造业就等于牵住了牛鼻子，抓住了主要矛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苏州制造”在内涵上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旧制造，“苏州制造”将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另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除了考虑“苏州制造”品牌以外，也要考虑苏州“江南文化”品牌，二者之间是一种魂与体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无论是“苏州制造”品牌和苏州“江南文化”品牌，都离不开苏州城市载体。“苏州制造”品牌、苏州“江南文化”品牌、苏州超大城市的打造，这三者构成新时代苏州发展的三大支柱或称之为“成长三角”，离开了其他两个支柱，也会影响“苏州制造”品牌的塑造。

数字赋能，擦亮“苏州制造”品牌不会一蹴而就

制造业构成了苏州的比较优势，但必须深刻认识到苏州制造业的内涵是不断变化，要深入了解“苏州制造”的时代内涵。外向型经济是苏州最大的特点，苏州外贸

依存度高达 125.7%。苏州发展必须要从单一依赖外部市场转向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内外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苏州要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主场全球化就是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建设。苏州优势在于制造业，但之前制造业是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之中，主要利用苏州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等。但随着要素成本的增加，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发展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苏州应该率先积极谋划未来苏州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新模式。进入新发展阶段，苏州制造业不再是传统意义旧制造的概念，而变成一个新制造的概念。新制造主要立足于新消费，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制造要借助于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效地重构制造业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空间组织形式，要形成制造业发展新的产业生态。

要擦亮“苏州制造”品牌，必须超越传统旧制造的单一制造环节，要实现研发、制造与市场在区域空间中的融合。上世纪 90 年代，苏州通过大量招商引资，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制造属于旧制造的范畴。旧制造业的发展是以生产为中心，是订单经济。制造业发展不会考虑上端的研发，也不会考虑后端的销售渠道，属于典型的代工，制造业被锁定在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研发、制造、市场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这是微笑曲线所表达的内容，微笑曲线是工业化时代旧制造的形象表达。支撑旧制造发展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的投入，依靠流水线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专家视点•

进入新发展阶段,制造业内涵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制造、研发和市场三个环节将出现频繁互动,信息技术提供了互动的基础。如果将研发、制造、市场分别用三个圆表示,在它们之间有个交集,交集部分用灰色表示,形象称之为“灰度创新”。研发与制造之间的灰度创新,是一种产业化创新的能力。灰度创新,“制造与市场”的结合部分,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新制造就是在研发、制造与市场的互动中发展,三者可以在同一空间中存在,这完全不同于旧制造。关注制造与研发、市场互动所形成的灰度创新,这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和新制造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灰度创新是苏州新制造发展的最大潜力点。苏州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业发展成为苏州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不要割裂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苏州未来的创新更多地体现在制造型的研发和制造型的创新,这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基础性创新,这是苏州未来最大的亮点和优势,也是拉动苏州制造业转型的战略引擎。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研发、制造和市场的互动,推动新的产业生态的形成。

德鲁克曾经说过:“创新意味着你对过去的系统性抛弃;创新意味着你对创

新机会的系统性探索;创新意味着你乐于面向创业精神来进行组织;创新意味着你乐于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之外单独地建立创新的企业。”聚焦数字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来讲,就是重塑产业生态,抛弃工业化时代的线性的科层的产业组织和体系的旧思维,重塑新的网络化、扁平化的新产业生态。工业 4.0 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而是将带来生产模式乃至整个工业生态的转变,被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市长李亚平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聚焦数字经济,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技术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围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发展平台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做大数字经济规模,推动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苏州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苏州市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等。这些具体的措施旨在通过数字赋能,打造“苏州制造”的新品牌这一战略目标,但需要深刻理解“苏州制造”的新内涵。即苏州新制造最根本在于改变第一波和第二波“苏

州制造”的线性的产业生态,形成基于信息时代网络化产业发展新生态。这种新生态通过数字赋能改变传统的科层结构,形成基于网络化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扁平化的共创价值的产业生态。新制造不同于旧制造,需要依靠大量的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现代生产要素来推动,围绕大量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新制造的发展,新制造需要区域和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撑,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业的发展是新制造发展的重要趋势。

以数字赋能,打造“苏州制造”新品牌是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不会一蹴而就,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力。在打造苏州新制造的过程中,要遵循经济规律,要因地制宜,要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要依靠市场力量,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战略作用。企业家能更高效地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是塑造产业新生态和苏州制造新品牌的最重要的主体,企业家能够知道未来市场的潜在需求,能够创造更好的产品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于缓解苏州文化产业融资难的政策建议

张 斌 马旻敏

编者按:近期,苏州召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加快实施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全面打响“江南文化”品牌。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苏州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的重要战略支点,但是当前苏州文化产业在融资方面存在较大缺口,融资难已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作者深入分析了文化产业融资难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近期,苏州召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加快实施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全面打响“江南文化”品牌。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苏州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的重要战略支点,但是当前苏州文化产业在融资方面存在较大缺口,融资难已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缓解融资难问题对于提升苏州文化软实力和核心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作了专题研究。

文化产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1. 扶持政策全盘统筹有待增强。文化产业在苏州一直属于重点扶持行业,“十三五”期间,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不低于 1 亿元的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同时还出台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但政策设计缺乏对区域板块的有效统筹。比如,各区(市)文化产业发展定位不够明确,导致重复建设和同质化建设严重;专项资金偏重于国有大型文化企业,而民营文化企业尤其是真正急需资金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很难获得资助;由于担保贷款条件苛刻以及版权质押困难等原因,具有轻资产特性的中小型企业常常由于缺少资金而举步维艰。

2. 高品质文化项目供给不足阻碍直接投资。苏州文化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的文化制造旧业态,与科技深度融合欠缺,难以满足不断更新的新文化消费需求。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数字文化产业创作和生产领域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与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缺乏能够在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的同时,结合新技术开发的高品质文化项目,使得民间资本很难在文化产业领域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

3. 缺乏完善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无形资产通常是文化企业的核心资产,但评估、交易及处置一直是金融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难点,直接影响了文化企业的投融资。以影视文化类企业为例,在制作、发行和放映的不同阶段,涉及

• 专家视点 •



到版权、衍生品机制等多个不同领域。而目前苏州市并没有完善的文化类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认定、交易、管理和处置等方面缺乏部门间协同机制。此外,在传统无形资产评估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以网络视频、动漫等互联网内容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企业评估方面仍有障碍。

4. 文化企业商业模式尚不成熟。文化企业大多是由从事文化艺术的人经营管理,往往会产生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不规范、衍生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这就加大了商业银行和投资基金的风险,同时也难以满足资本市场对盈余质量和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缓解文化产业融资难的对策建议

1. 完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体系。一是强化协同机制。明确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定位与目标,并结合不同地域文化特色,推进文化骨干企业、风险投资与金融机构、相关研究机构及院校等优势资源向区数字文化产业集聚区等产业园区集聚。二是优化财政扶持方式。合理规划专项资金支持对象和支持方式,适当向新兴文化业态和创新创意项目倾斜,重点资助新产品开发项目、延长产业链项目和基础类项目。由直接支持方式向贷款贴息、陪同资助、风险补偿等投融资支持方式转变。实行专项资金全过程跟踪和动态绩效评价制度。

估制度。

2. 完善文化产业价值评估标准和融资担保体系。一是鼓励资产信用评估机构、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企业开展合作,共同研究出适合文化产业的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二是组建权威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机构,在深入研究各类文化企业盈利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文化资产评估框架、核算指标和参数,并根据宏观环境和产业发展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三是引导设立对文化产业的专业担保公司或再担保公司,将部分专项资金财政拨款改为对担保公司的专项投资。同时,进一步完善中小文化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文贷通”担保基金等相关政策,由基金与众多商业金融机构合作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

3. 加快建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一是实施文化企业征信建设。由行业组织全面评估企业诚信状况,同时引入外部评审机制,通过设计评级指标体系、服务考评体系建立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二是建立文化企业优秀项目备选库。甄选入库过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优秀项目备选库的企业可以优先获得政府资金、金融支持或政策优惠,反之一旦有不规范行为就应当被及时清理出库,以此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三是建立文化企业信用风险评级体系。依据企业经营项目合法合规能力、公共关系、核心产品或项目生命周期、

所处行业地位、销售渠道或市场占有率、市场定价能力、管理水平和公司治理结构、财务指标、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考察其是否具备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和成长空间,并以此为依据对企业的信用风险进行评级。

4. 灵活运用多种融资方式。一是积极引入投资基金。优化和完善苏州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满足初创型、成长型、领军型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建立文化企业融资项目库,定期开展上市培训和融资对接活动。二是探索供应链融资模式。充分利用文化产业链短而简单,上下游关系稳定的优点,围绕蜗牛公司和欧瑞动漫规模较大、信用程度高的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活动,对核心企业上下游众多中小文化企业采用版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等多种方式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三是加快利用债券市场作用,发行项目收益债券和中小文化企业集合债券。鼓励一些信誉高,预期现金流稳定,经营业绩较佳和财务状况良好的文化企业通过发行项目收益债券筹集资金。四是鼓励高成长但核心财务指标尚达不到上市标准的文化企业,采用并购、托管、资产置换等资本运作方式捆绑上市,同时也可以考虑利用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达到直接融资的目的。

5. 创新商业模式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一是完善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内部业务流程和财务运作,建立成熟高效的商业模式,增强产业链条延伸能力、衍生产品拓展能力和跨界综合能力。二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协作引领、产品创意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作用,带动中小企业朝集群化、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三是依托互联网传播渠道、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对苏州文化典籍、艺术品、文物、非遗等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立体性、多元化开发。同时推动苏州文化场馆、文娱场所、景区景点、街区园区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关于创新人才公寓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屠立峰

编者按:人才公寓承载着吸引人才、推动产业及城市发展的重任。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公寓建设模式,让人才在苏州工

作和生活更舒心,成为一项紧迫课题。
近日,东吴智库研究员屠立峰副教授在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调研通报》上

撰文,对各地创新人才公寓建设的特点与多元化发展模式进行深入的剖析。
现将全文奉上,以飨读者。

•专家视点•

人才聚则产业兴、经济旺。人才之争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大计。苏州全市人才总量达 293.4 万,其中高层次人才总量突破 27 万,引进海外留学人员超 4.8 万。人才公寓承载着吸引人才、推动产业及城市发展的重任。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公寓建设模式,让人才在苏州工作和生活更舒心,成为一项紧迫课题。为此,本文做了专题研究。

一、人才公寓成为国内外城市筑巢引凤的有力抓手

“人才”并不是低收入者,只是相对当前房价而言,他们的收入“暂时”不足。各地在推介本地人才政策时,都很注重强调人才公寓的筹集或建造。较大规模的人才公寓项目能够带动周边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的提档升级,从而促进整个区域高质量发展。目前,各地人才公寓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供给方式呈现多元化。地方政府结合当地住(租)房市场价格、人才的收入水平等因素,设计出合理的补贴标准,根据土地供应情况,采取“租”“售”结合模式。一是“租售结合、以租为主”模式。例如,深圳先前提出在 2016 ~ 2020 年供应不少于 1 万套人才公寓,后又承诺到 2035 年新建或筹集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 100 万套。人才公寓采用可租可售、以租为主的方式,面积以 90 平方米左右为主,并给予租房补贴、免除租金等优惠。一方面加大住宅类用地供应,另一方面鼓励已批商务公寓项目转为可售型人才住房,同时还明确减少商业用地比例,增加居住及配套用地比例。二是“只租不售”模式。例如,杭州在 2018 ~ 2021 年建设 5 万套人才租赁房,采用只租不售方式,公寓面

积在 40 ~ 120 平方米。同时,给予租房补贴、减免租金等优惠。武汉,在 2019 年筹集 5 万套人才公寓,也采用只租不售方式,面积在 40 ~ 60 平方米,给予租房补贴、享受 5 ~ 7 折减免等优惠。三是“租售结合、以售为主”模式。青岛在 2019 ~ 2020 年建设和筹集不少于 12 万套,2021 ~ 2022 年供应不少于 3000 亩土地用于人才房,采用可租可售、以售为主的方式,租赁房面积在 30 ~ 50 平方米,销售房面积在 60 ~ 80 平方米,给予人才安家补贴、租赁购买享受 6 ~ 8 折优惠、减免租金等待遇。成都,在 2017 ~ 2021 年建设约 30 万套人才公寓,提供先租后售、共有产权和优惠出售等多种选择方式,面积在 60 ~ 120 平方米,给予人才住房补贴、购买享受八五折优惠以及租金减半等待遇。

2. 投资主体涵盖国有和社会资本。从项目投资主体看,国内人才公寓建设基本是国有投资公司发挥主力军作用,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国外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资本主导人才公寓建设模式。一是国内国有资本主导模式。国有投资公司一直是人才公寓建设的主力军。例如,深圳组建了专职筹建公共住房的国有独资企业——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只租不售”和出售型人才住房建设的先行者。在成都,城投置地、成都高投成为人才公寓开发建设主力。国内也有社会资本主导的案例,但资金链断裂风险较高,典型的如杭州“浙江大学人才公寓”长青嘉苑二期工程至今烂尾。二是国外社会资本主导模式。英国伦敦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形成了较为成功的“建后出租”模式。“建后出租”是指由开发商(社会资本)进行投资、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的租赁住房“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模式。所建住房主要面向在伦敦长期

工作和生活的居民,不同于其他社会租赁住房,该政策下的住房可在一定限制条件下进入市场交易。伦敦政府采取了激励措施,例如,划拨 10 亿英镑作为启动经费支持“建后出租”住宅项目开发,市长办公室提供住区规划指导并免除 3% 的土地印花税,部分自治市还将政府持有的土地出让给开发商建设该类住房。“建后出租”模式下建设交付速度较快,投入运营后马上获得收益,稳定的现金流入足以支持新项目建设,形成良性循环。值得强调的是,该类项目是由住房协会负责管理和运营。在发达国家中,第三方专业租赁机构普遍存在,而且在保障房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伦敦外,还有阿姆斯特丹住房协会,苏黎世等北欧国家城市的住房合作社和房屋委员会等。多国政府均选择在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后将房屋交由这些第三方专业租赁机构运作供应,培育专业租赁机构对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防止房地产企业垄断具有重要意义。

从苏州实践来看,工业园区早在 2007 年起就开工建设优租房,还设计出虚拟优租房机制,该机制实施范围已扩展至整个苏州城区。相城区推出近 6800 套人才公寓,高新区将在未来 3 年筹集 2 万套人才公寓,充分展现出苏州各地直击人才住房痛点的决心。然而,苏州土地资源稀缺属性十分明显,如古城区、工业园区湖西等,这些地区公租房源筹措难度大,收购房源也较为零散,不利于后续管理。引进人才只能租住企事业单位所在区(市)的人才公寓,跨区域租用存在壁垒,抑制了个性化的选择需求及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外,各区(市)住房补贴政策落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才公寓入住和享受补贴门槛普遍较高,政策惠及面主要集中于高级专家和领军型人才等高端人才,或者本区域重点产业、重点单位指定的专业人才,而多数



• 专家视点 •

正处于事业发展上升阶段的青年后备人才申请等候期较长,引起了人才招引。

二、创新苏州人才公寓建设的建议

1. 激励市场主体投资建设人才公寓。一是出台市场主体参与人才公寓建设的方案,明确路径、牵头部门和管理标准(消防安全、房屋性质等方面),完善相关鼓励政策。二是重点支持国有企业作为投建和经营青年人才公寓的主体,减轻国有企业因项目盈利回报周期较长而面临的考核压力,并在房产税、企业增值税等方面适当予以减免。三是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人才公寓建设的积极性。例如,鼓励开发符合人才个性需求的邻里中心配套项目,以培育人才公寓住房消费作为项目运营阶段的赢利增长点,具体可结合入驻人才的专业特征,完善会议室、自习室、研讨室、文印室等工作设施,电影院、体育馆、演艺厅等文体设施以及洗衣房、日托

中心等生活配套设施。

2. 探索将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引入人才公寓项目建设。工业园区已成功发行 4 单类 REITs 产品,底层资产包括社区商业、写字楼及产业园等,在 REITs 市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类 REITs 经验。建议:一是对人才公寓项目 REITs 的机构主体、管理运营、产权转让、退出机制和收益分配做出明确表述,健全法治化保障体系,促进人才公寓项目 REITs 的高效运行,降低设立和运营中的监管不确定性风险。二是提供配套优惠政策和税收减免。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对人才公寓项目 REITs 的资产买卖免征印花税,对 REITs 包含的商业配套物业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对投资者获得的利息分配免征个人所得税等,提高投资人才公寓项目 REITs 的实际收益,增加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3. 探索公积金支持人才公寓建设机制。在优先保证缴存职工提取和个人住

房贷款、留足备付金的前提下,可研究利用部分公积金资金支持人才公寓建设。建议:一是发放项目贷款支持人才公寓建设,或购买由市级人才公寓建设平台定向发放的企业债。二是探索公积金增值收益进行直接收购、投资建设人才公寓,提高住房供给,降低租金水平。

4. 规范人才公寓管理,提升租赁住房流转效率。一是推动出台《苏州人才公寓住房租赁条例》,明确规定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市场行为,保护各方权益,推动形成长期稳定的租赁关系。二是开发覆盖全市范围的“人才公寓租赁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满足租赁房源管理、网上签约、网上备案、租赁市场大数据分析、信用档案管理等功能,减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三是培育专业的人才公寓租赁机构。鼓励苏州房地产行业协会等非营利性机构积极参与租赁住房的管理和运营,形成营利性机构(开发商)和非营利性机构(人才公寓中介)各司其职的分工格局。

传承弘扬张謇精神，办人民满意的民办教育

王一涛 刘承波

编者按：民间办学曾是我国古代和近代教育的主要力量,春秋私学、宋代书院都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更是树立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典范。私立教育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教育家,张謇作为我国近代私立教育中的杰出教育家之一,在兴办实业的同时注重发展教育,主张“以实业辅助教育”“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独自创办或参与创办基础学校、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等近 400 所学校,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

作者紧紧围绕习总书记重要倡议,从传承弘扬张謇的精神理念和推动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两个方面展开深入探究。

现将全文奉上,以飨读者。

民间办学曾是我国古代和近代教育的主要力量,春秋私学、宋代书院都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更是树立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典范。私立教育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教育家,这些教育家胸怀天下、殚精竭力、筚路蓝缕,书写了我国私立教育的璀璨篇章。

张謇,我国近代私立教育中的杰出教育家之一。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注重发展教育,主张“以实业辅助教育”“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独自创办或参与创办基础学校、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等近 400 所学校,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数个“第一”。他创办或参与筹建的多所高校,成为南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相关院系的前身。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高度评价张謇,称其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020 年 11 月,习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又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习总书记指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影响深远,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习总书记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民营企业发展和企业家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民营企业要见贤思齐,增强家国情

怀、担当社会责任,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要勇于创新、奋力拼搏、力争一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习总书记还强调,要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

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和张謇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已经建起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教育体系,国民素质大大提高,正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我国正逐步形成以公办教育为主体、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截至 2019 年我国约有



• 专家视点 •

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19 万所,占全国比重 36.13%,民办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虽然沧桑巨变,但张謇精神依然值得新时代民办教育办学学习借鉴。新时代的民办教育办学,应当潜心领会、踏实践行,为张謇的精神理念注入新的时代能量。

一要学习张謇的爱国主义精神。张謇在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之时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兴办实业和教育,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以人才发展实业,以实业振兴国家,“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自立学”。今日之中国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新机遇与新挑战相伴相生。今天的民办教育办学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密联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二要学习张謇的公益办学精神。“身在畎亩、心忧天下”的儒家理想信念是张謇兴办慈善公益事业重要精神动力。张謇(含其弟兄)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高达 300 万元(当时一般男工日工作时间至少 12 小时,日工资为 2.5—6 角),“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多用于教育慈善公益”。张謇将所创办的纱厂命名为“大生”,“大生”之名取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一开始便对大生寄予了泽被天下的厚望。在他看来,大生纱厂的获利与南通慈善公益之事是二位一体的。今天的民办教育办学也要坚持公益性办学理念,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高水平人才作为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正逢我国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重要时间节点,《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即将出台,应当鼓励更多的民办高校办学选择非营利性发展道路。即使选择了营利性发展道路,也应该淡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将办学经济回报的目标让位于人才培养这一首要目标。

三要学习张謇的改革创新精神。张謇抛弃了很多传统读书人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封闭心态,吸收借鉴了当时国外教育的先进模式和内容,从而形成了在当时颇具创新的办学理念 and 办学模式。从办学形式来看,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第一所民间博物苑、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中国人办的盲哑学校,领一时风气之先,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改革者。我们今天的民办教育,也应充分发挥民办教育的体制机



制优势,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探索教育制度创新,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积累经验。张謇在兴办纺织等领域的职业学校时,特别强调产教结合和教育实践,“父教育而母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专门教育,以实践为重”。我国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属于高职院校或应用型本科高校,不少民办高校是企业或企业集团所创办的,同区域产业界联系密切,在产教融合中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实习实训等环节具备先天优势。民办高校应该发挥这些资源优势,创新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具体举措,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着力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传承弘扬张謇精神,不仅仅是民办学校办学者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都要为践行张謇精神提供良好的环境。张謇所处的时代,政府孱弱不堪,他所创办的教育和社会事业大都是弥补官办事业的缺位。今天我们处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日趋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我们既应该举办一流的公办教育,也应该举办一流的民办教育。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我们对民办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够深入,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措施还有待健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该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是充分认识发展民办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教育资源还不够丰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呼唤更充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仅仅靠公办教育满足不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需要。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教育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资源投入方式、产品性质、与政府关系等方面虽然存在很大不同,但两者都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建设教育强国,满足人民群众对个性化多样性的教育需求,既需要高水平

的公办教育,也要建成一大批高水平的民办学校,着力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是要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民办教育、支持民办教育的浓厚氛围。倾听民办教育办学者的的心声,关心他们的合理诉求。尊重民办教育办学者的创新精神,破除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加强对民办教育办学者的培养和培训,催生一批爱国家、懂教育、有情怀的民办教育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兴办民办教育,将兴办教育作为回报社会的方式,在新时代形成“一流企业办一流民办大学”的新局面。

三是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首先要完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配套政策。民办教育实施分类管理是我国教育治理的一项重大决策,但国家层面相关法律和政策出台后,配套政策一直不明朗,各省也鲜有实质性的配套政策或办法。要尽快出齐配套文件,依托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多部门协同研究制订支持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一揽子指导意见,形成扶持力度更大、措施更精准、环境更友好、上下衔接、协调一致的制度体系。其次要完善民办教育的公共财政资助政策。国家立法鼓励、省级政府加快研究并落实民办学校生均财政拨款制度和民办高校办学贷款普惠制度。再者要明确民办学校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整合民办教育税收政策规定,明确落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明确营利性民办学校税收优惠标准和项目。

张謇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事迹在新时代仍然焕发着耀眼的光彩,其深厚的爱国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进的教育理念、超越的改革意识、宏阔的开放襟怀为当今广大民办教育办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民办教育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勇立潮头、勇担重任,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各级政府部门

• 专家视点 •

应该为民办教育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明确民办教育的定位,统一认识,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后跟进

制定并实施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民办教育充分发挥自身体制机制优势,着力形成层次类型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公、民办教

育协同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后扶贫时代，筑牢贫困治理的安全阀

刘成良

编者按：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行动为脱贫工作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然而作为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贫困治理依旧是我们需要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步入后扶贫时代，中国的贫困治理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近日，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刘成良在《环球时报》上撰文，针对中国后扶贫时代的潜在返贫风险要素与对应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现将全文奉上，以飨读者。

贫困治理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告别了贫困问题，我们应当筑牢贫困治理的安全阀。从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来看，一些潜在的返贫风险要素需要注意：

一是扶贫产业发展模式能否持续有效应对市场风险。产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影响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关键。尤其是高投入、高风险的农业产业，前期较为可观的收益并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如不谨慎应对和及时调整发展方向，难免产生路径依赖背景下的产业风险。比如

市场供应过量易造成收益锐减、地区竞争带来的产业优胜劣汰、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造成的成本损失等，这些问题均有可能增加重新返贫风险。

二是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相对脆弱，难以有效应对现代性风险。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等是贫困治理中的顽疾。尤其是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的家庭生计结构相对脆弱，积累比较有限，很难应对突发问题造成的巨额损失。脱贫攻坚阶段已经化解了大量类似问题，但是相较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风险要素，这些问题对农民家庭返贫的威胁很难彻底解除。

三是作为人力资本提升关键的乡村教育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贫困治理的长效路径在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前提是教育的稳步发展。虽然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因贫失学等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但是乡村教育面临着新的结构性困境：留守背景下农村学生由于沉迷游戏等导致学习兴趣不足；“读书无用论”依然占有一定市场、存在隐性失学问题；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与农民期待的存在一定落差等。这些因素造成一些地方的教育发展长期滞后，在深度贫困地区表现得相对突出。

四是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不够牢固，面临债务陷阱。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是脱贫攻坚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由于一些地方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空心化难题，也缺乏必要的人力和资本支撑，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考核任务，通过行政手段来指导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造成一些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够牢固。前期存在盲目上项目、造亮点等问题，并且一些地方为了解决贫困人口增收问题而设置的公益性岗位也对地方财政实力提出较高要求，这些项目的后期维护以及公益性岗位的持续支持仍然需要大笔资金。隐性债务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地方发展困境。

当然，这些潜在返贫风险并不必然会造成大规模返贫问题，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关键在于保障政策支持的连贯性和有效性，中央政府为此专门设置了五年的过渡期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在探索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过程中，这些潜在返贫风险也能够得到新政策的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贫困瞄准能力，即健全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机制，及时发现新的致贫要素与返贫现象，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干预，为贫困治理筑起安全阀；探索宜工则工、宜农则农的农村产业发展路径，尤其是要注重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多样性的引导和支持，避免一刀切式的产业发展路径干预，通过多元化产业来增强农民家庭韧性；重视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完善贫困地区教师激励机制，在做好基础保障的前提下，引导优秀师资向贫困地区倾斜，同时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环境建设，整治过多的检查评比以及迎检等行政事项，赋予基层学校更大的自主空间来探索适合地区情况的教育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要及时总结精准扶贫时期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在乡村振兴阶段，要避免大干快上、造亮点、上大项目的倾向，同时摸底排查村庄隐性债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既往项目绩效清单，进一步巩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